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生命力在于理论的彻底性与对现实的解释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为思政课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然而,当前部分思政课课堂仍面临着宏大叙事与学生个体经验脱节、单向知识灌输导致情感共鸣不足、实践教学流于形式等困境。如何将国家层面的理论话语体系,转化为学生可感、可知、可信的内在于价值认同,是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必须回应的课题。在此背景下,广东海洋大学立足湛江,探索将区域性红色文化深度融入思政课教学全过程,不仅是对教学资源的有效拓展,更是一场旨在弥合理论与现实鸿沟、增强教学实效性的深层改革。

一、从“地方记忆”到“育人资源”:湛江红色文化的时代意蕴与价值阐释

任何一种文化资源,其育人价值的实现都依赖于对其内涵的深度挖掘与时代性的阐释。湛江,作为粤西革命的策源地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实践区,其积淀的红色文化并非孤立的历史遗存,而是一个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动态发展谱系。

(一)历史坐标中的精神谱系:湛江红色资源的层次性

湛江的红色文化资源呈现出清晰的历史脉络与多层次的结构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南路革命和粤桂边区革命为代表,涌现出黄学增、林飞雄等革命先烈,铸就了忠诚信仰、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这是区域红色文化的“根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雷州青年运河的修建,是青年一代响应党的号召、战天斗地的时代壮举,孕育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建设精神,是红色文化的“新传”。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从服务国家“863计划”的海洋科技攻关,到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再到连续七届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所彰显的军民鱼水深情,湛江的实践生动诠释了改革创新、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构成了红色文化的

地域红色文化的时代赋能:湛江样本与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路径探析

■马宁 徐延民

“新篇”。这一系列资源共同构成了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一以贯之的“红色基因库”。

(二)价值引领下的育人功能:从认知、情感至行为的闭环

湛江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体现在其能够构建一个从“认知输入—情感共鸣—行为塑造”的完整育人闭环。

其一,认知塑造功能。通过南路革命史、青年运河建设史等具体、鲜活的地方史实,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等课程中的宏大理论具象化,为学生提供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区域性注脚,有效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

其二,情感涵育功能。革命烈士的家国情怀、建设者的奋斗激情、新时代楷模的担当精神,这些蕴含在红色故事中的高尚品格,超越了冰冷的文字,能够直抵人心,激发大学生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情感由外在要求内化为精神自觉。

其三,行为导向功能。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最终指向行动的感受。通过学习与体悟,引导大学生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自觉以革命先辈、建设楷模为榜样,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战略,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从“融入”到“融通”:湛江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教学的实施路径

湛江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教学,并非简单的内容叠加,而是一场涉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的系统性重构。我们探索构建一种“三维一体”的实施路径,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

(一)内容重构:建构“国家叙事—地方印

证”的同心圆教学体系

针对思政课内容相对抽象的问题,我们以教材的知识体系为“圆心”,以湛江红色文化为“半径”,画出理论联系实际“同心圆”,实现国家宏大叙事与地方生动实践的同频共振。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讲授“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时,引入湛江地区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讲述“解放战争的胜利”时,结合粤桂边区人民武装破袭湛江、解放湛江等战役,使学生在“身边”的历史中感受革命的波澜壮阔。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讲授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深度剖析雷州青年运河工程的决策背景、建设过程与精神价值,作为解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生动案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中,讲授海洋强国战略,融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湛江国家863计划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的案例,结合湛江海洋牧场建设的最新进展,让学生直观感受新思想在地方的实践伟力。

(二)方法创新:实现“叙事转向、技术赋能、问题导向”的多维交互

教学方法的正守创新,旨在超越传统单向灌输模式,通过构建多维互动与情境融入,有效激发学生主体性,切实增强理论的吸引力与时代感。

其一,推动叙事转向,增强情感代入。改变“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灌输模式,组织学生开展“红色人物我来讲”活动,通过情景剧、微电影等形式,让学生自己去挖掘、演绎黄学增、钟竹筠等烈士的故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模范、新时代奋斗者的事迹。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叙事方式,更能促进教学内容的“接地气”与情感的“零距离”。

其二,实施技术赋能,再现历史情境以深化

体验。积极拥抱教育数字化浪潮,借助沉浸式体验技术对湛江地区的重大革命事件、关键建设场景等进行数字化重构。通过构建高保真的虚拟教学环境,引导学生跨越时空壁垒,直面历史的厚重与鲜活,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与革命先辈、建设楷模产生深度共情,完成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到主动的价值探索者的转变,最终实现理论内化与情感升华的有机统一。

其三,坚持问题导向,激发探究精神。结合PBL(问题式学习)、TBL(团队式学习)等方法,设计具有启发性的研讨课题。例如,“试论雷州青年运河精神在当代青年奋斗中的时代价值?”“湛江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如何更好地服务海洋强国战略?”等。通过任务驱动,引导学生自主查阅资料、团队协作、辩论研讨,将学习过程转化为主动探究与价值建构的过程。

(三)实践拓展:打造“基地矩阵化、活动主题化”的行走大思政课

打破课堂的物理边界,将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紧密结合。这意味着推动思政课教学从单一的知识传授场域,走向开放的社会实践场域,将社会现实转化为思政育人最鲜活的教材与最坚实的支撑。通过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感知时代脉搏、确证理论价值,最终达成知行合一。

其一,构建思政实践教学基地“矩阵”。整合湛江地区的红色资源,系统规划、分类建设实践教学基地群。既包括粤桂边区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也包括雷州青年运河、湛江港等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示基地,还涵盖湛江军事博物馆、国家863基地、金牛岛红树林保护区等新时代发展与国防教育基地。通过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基地矩阵,为开展“行走

的思政课”提供坚实的载体支撑。

其二,设计“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主题实践线路。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湛江的路线为索引,精心设计集理论宣讲、实地考察、社会调研、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系列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在重走总书记足迹的过程中,亲身感受湛江在海洋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成就,深刻领悟新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其三,开发“云端”实践教学平台。针对学生数量多、时间紧张等现实困难,运用数智技术将实体基地“搬”到线上,开发虚拟展馆、数字档案库、口述史访谈视频集等。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打破了时空限制,使红色文化教育常态化、便捷化,让红色基因的传承“永不掉线”。

三、结语

将湛江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超越了单纯的课堂教学内容,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教學理念革新与实践模式重塑。这一探索证明,地方性红色文化是思政课最宝贵的“富矿”,是连接宏大理论与鲜活现实的最佳“桥梁”。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师,应勇于担当,深入挖掘本土红色资源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创新教学话语体系与实践范式,真正让思政课“活”起来、“火”起来,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智慧和力量。

基金项目:2022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融合式教学的PBL、TBL、情景体验教学方法探究与实践”(项目编号:粤教高函〔2023〕4号);湛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在湛江地区领导的重要战役研究”(项目编号:ZJ21QN06);2024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基于AI的思政教育模式构建与有效性评估研究”(项目编号:粤教高函〔2024〕30号);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2025年高等教育研究课题“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5GYB043)。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浅谈新闻采访中采访的准备

■李普曼

新闻工作的特殊规律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许多特殊的要求。熟练地掌握采访艺术,是基本要求之一。

记者的任务是什么?采访与写作。在二者的关系上,采访是前提、是基础,写作是采访的结果。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报道是第二性的。要使新闻准确地反映客观存在,首先要过好采访关。如果把采访当作一件工业产品,采访就是其生产企业的原料。没有合格对路的原料,再先进的制作加工工艺也无济于事。没有采访得来的足够的素材,再大的手笔也写不出好新闻。

如果把一次采访比作一场战斗,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战前准备的重要。一支部队在投入战斗前,要擦亮枪炮、备足弹药;要通过侦察,对敌情、对敌阵地、对敌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等进行必要的了解,然后根据掌握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战术。同样,记者在投入采访前,也要进行相应的准备,这样才能避免无把握之仗,为采访成功打好基础。

一般情况下的报道,在进入采访前需做哪些准备呢?

首先,尽可能多地掌握采访对象的基本情况。在确定报道选题以后,利用现有的条件,对采访对象作尽可能深入、详尽的了解。这种了解一是对全面情况的了解,二是根据采访选题进行某一方面情况的重点了解。在全面了解中,

如果采访对象是一个人,应该了解他的年龄、性格、经历、学历、职务、工作成就、家庭状况等;如果采访对象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应该了解它的人员构成、领导班子、机构沿革、工作情况等;如果采访对象是一个事件,要了解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发生的背景、可能的发展趋势等。在对全面情况进行了解的同时,还要根据选题所确定的报道角度,对采访对象进行特定方面情况的了解。如采访一个政府机构转变职能、加强服务,就要重点了解这个机构掌握着什么权力,在人、财、物方面与基层、企业是什么关系,它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它的管理对象对它的评价等。

其次,要进行理论、政策和基本知识方面的准备。理论、政策的准备,可以使我们的报道思想更加明确,对采访对象所具有的新闻价值有更准确的把握。而有关基本知识的准备,则对一些特定采访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许多新事物、新问题摆在记者面前,世间百态、千变万化,再高明的记者也不可能对所有变化都有全面、准确的认识和理解。如近两年开始出现的AI热,为什么会热起来?是利大还是弊多?是继续热下去还是慢慢冷下来?记者如果不对相关理论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进行认真学习,能写出精彩的新闻吗?

以上关于采访对象基本情况的准备和理论、政策、知识的准备,可以从实际条件和需要

出发采用不同的方法。如查阅自己的“资料库”。口头向同事或有关人员了解,向有关部门和单位索取文字材料等。总之一个标准:感觉够用了为止。

第三个方面的准备是制定报道计划。作计划可以是见诸文字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存之于心里的。计划可以是公诸于采访对象的,也可以是记者或编辑部内部掌握的。它就像一支部队战前制定的战斗方案一样,是指导采访顺利进行的蓝图。一些重要的选题报道和重大活动报道,尤其要作好计划,这样才能使报道有板有眼、有声有色。如果是编辑部组织的重点报道,有了计划就可以使记者们明确任务,心中有数。如果是记者自己琢磨着搞的报道,最好是与编辑部通气、协商,取得一致,以求报道能够按计划落实。

采访前要做的准备,大致如上所述。每次采访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如何准备,视具体情况而定,有时只需进行一两个方面的准备,有时则几个方面的准备都要做。如每年一次的人大、政协会议的报道,已成为国家和省、市、县新闻单位例行的报道任务。虽然“两会”年年开,但每年都有新变化,不管是一个新闻单位还是一个记者,都要在进入“两会”采访前进行全面的准备,非如此不能使报道出新,使报道年年有突破。

(作者单位:河北阅读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述评

■王心慈 舒智凯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实施场域,更是基层文化服务体系运行的载体与乡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依托。作为乡村振兴之魂和推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化之基,其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精神生活和思想状况,进而塑造并维系着乡土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秩序。为响应物质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政策导向,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出发,在对国内外现有研究进行比较、鉴别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学和文化学相关学科视角,廓清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内涵及结构,为未来研究的深挖方向提供大体路向和探索可能。

一、回望公共文化空间内涵界定的有关研究

作为农村居民参与与文化生活的场所载体,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指向地理学上的现实存在空间,还兼具公共精神和归属意识的社会意义,在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诸多学派依据不同学科理论基石,从多维视角展开对公共文化空间的探索。“公共空间”理论始自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探讨,继哈贝马斯后众多学者也对公共空间展开深入研究。彼时学界普遍认为公共空间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市民阶层有意识进行公共活动的场域,注重空间的公共性。马克思在学说中提出,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空间,具备使用价值并能创造剩余价值。他强调空间生产与消费在激发城市运动中的突出作用,从而将空间扩展到“社会空间”领域(伍乐平,张晓晔,2016)。我国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公共空间是指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形式,将其界定为乡村变迁场景中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场域(曹海林,2005)。王玲(2010)则进一步提出乡村公共空间是介于私人空间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场所,社会学对其研究可概括为:社会结构、文化及治理。

“文化空间”理论则源于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的研究,其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生产的过程”,空间具有感知—构想—再现三重辩证互动的属性。其后文化空间内涵扩展,泛指“一种物质空间或社会空间”,它是拥有这一空间的特定群体的一整套相关行为和生活方式”。我国学者指出,农村公共空间并不单是一个拥有固定边界的实体空间,同时也是一个被附加诸多外在属性的文化范畴(朱海龙,2005)。例如,马永强从文化建设的视角出发,提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人际交往的主要空间和乡村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因此培育和拓展乡村文化空间是建设乡村文化、推动乡村精神生活提振的重要途径。

过往研究多从单一维度解构公共文化空间内涵,即将公共文化空间拆解为公共空间亦是文化空间。在我国,系统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概念始于2005年开启的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通常指向由政府或社区组织提供和管理的、供全体村民共同使用的文化活动现场。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本文拟对其概念进行进一步界定: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以村民为主体的,通过多维功能融合、数字技术驱动和文化治理创新等手段实现空间赋能的,承载集体记忆、激发文化创造力及促进精神生活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场域。这一界定将公共空间的核心旨归设定为实现文化资源可及性、参与公平性与价值认同性。

二、回顾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解构的既往研究

因国外侧重从宏观和理论层面探讨农村空间的转型及变化的研究倾向,西方学者对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分类问题普遍并未进行深入探讨,而致力于从理论层面对文化空间和公共空间两者分别进行划分。雷蒙·威廉斯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将文化空间分为主导文化空间、残余文化空间和新兴文化空间,强调文化空间的现实社会属性;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则将公共空间分为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理论中强调,对于空间的研究,必须揭示出物质、精神和社会三维的理论统一性。

在吸收上述观点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我国学者进一步将公共文化空间这一议题同我国农村具体现实相结合,从多元视角对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行划分。从功能角度出发,李小云、孙丽把农村公共空间划分为五大类型,分别是组织型公共空间——寺庙、教堂、祠堂、村委会;生活型公共空间——洗衣码头、小商店、集市;休闲型公共空间——广场、山岩洞、老年活动室;事件型公共空间——农民运动会、红白喜事;项目型公共空间——政府扶贫项目、NGO社区发展项目。从主导主体出发,李少惠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划分为政府主导型、民间自发型和市场化驱动型。曹海林还尝试以型构动力为分类依据,将村落传统公共空间划分为“行政嵌入型”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两种理想类型。当前国内学界普遍认同的划分则是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界定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活动空间和制度空间组成的多维空间,并提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经历了乡村图书馆—农家书屋—农村公共阅读空间—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路径(张培奇,胡惠林,2018;汪全莉,叶茂林,2024)。

基于数字技术赋能在现代治理体系中的突出地位,未来研究在延续过往政府对规范体系的关注的同时,更应突破单一政府主导模式将社会组织、合作社等多元主体协作网络纳入研究,聚焦新媒体时代农村信息传播的话语权使用问题。在响应数字乡村战略的基础上,直面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领域存在的困境。通过构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评估测量模型深入研究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优化路径,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三、探究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评估与测量模型

罗葵(2023)指出,西方学者对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虽有相对成熟的乡村建设理论思想作为精神指引,然而对具体建设内容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主要是以定性或定量方法研究某一特定种类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并进行价值评估。其中较为成熟且普遍运用的是以克拉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所提出的场景理论。该理论认为场景是城市中生活娱乐设施的组合,蕴含在这些场景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形成抽象符号和信息传递给不同的人,从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选择。该理论主张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加以量化,通过数据对其进行评估与测量。

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傅才武、侯雪言从场景维度出发,利用“场景理论的主观视域”提出三个主文化、价值理维度和五个次维度”,结合实地调研数据建立乡村公共文化共享空间场景测量量表,利用主成分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多种计量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设计出分析当代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情景的深入探讨。

为破除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存在的单一化规范性表达的实践困境,未来研究应在构建本土化的理论框架,运用参与式研究方法、结合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进行实地调研等方面开展细致研究,深入探索。依据推进城乡地区共同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探索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优化路径的理论设计奠定坚实现实基础。

基金项目:“苏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Undergraduate Training Program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oochow University)资助,(项目编号:202510285105)。(作者单位: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横山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

■张梓晴

横山红色文化对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激发民众具有能动性的作用。它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理想,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横山红色文化所展现的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也鼓舞当代人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为民族复兴伟业添上自己的一块砖。这种激发民众能动性的作用,是横山红色文化政治价值的重要体现。

二、文化传承价值

横山红色文化承载着丰富的革命历史记忆,是传承先烈精神的重要载体。“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中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横山地区的红色文化历史沉淀,孕育着深厚的革命历史痕迹与英勇烈士的高尚品质。该历史篇章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时期对陕北民众参与革命斗争的领导线索。追溯横山红色文化的传承脉络,得以窥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所展现的英勇斗争历程,深切感悟他们那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与崇高的革命毅力。这种革命历史记忆和先烈精神的传承,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三、德育价值

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教育平台设计与实施

■邹鑫桐 张思宇 兰晓娟

适的挑战与支持。同时,通过实时反馈和评估帮助学生调整学习策略,并通过互动学习和社交功能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知识共享。

三、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教育的实施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涵盖自然语言处理(NLP)、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计算机视觉等技术。NLP能够精准分析学生的语言表达与问题,为其提供智能解答与个性化学习资源;机器学习通过对学生数据的深度分析,识别其学习模式、兴趣点及薄弱环节,从而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推荐,提升学习效率;计算机视觉则通过捕捉学生的面部表情与眼球运动,分析其情绪反应与注意力分配,从而优化学习体验,确保学生能够在适当的情境下获得最佳学习效果。平台的运营需要定期更新学习资源,保持内容的时效性,同时建立完善反馈机制,不断优化平台的推荐系统和算法,确保个性化教育更加精准。

四、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尽管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具有巨大潜力,但在实际应用面临诸多挑战。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亟待解决,因平台需要收集大量学生个人信息和学习数据,保护数据安全是关键。解决方案是通过加强数据加密技术,确保学生信息不被泄露。技术与教育的结合存在难度,尤其是教育行业从业人员的跨技术背景。为此,需加强教师与技术人员的跨界培训,推动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

五、结语

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教育平台为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它不仅能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内容,还能帮助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然而,技术的不断发展也要求我们不断优化平台的设计与实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个性化教育将成为未来教育的重要趋势,推动教育模式的深刻变革。

(作者单位: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教育平台设计与实施

一、引言

传统的教育方式往往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进度由教师决定,这使得每个学生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个性化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能够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计划和教学资源,实现真正的个性化学习。本文将围绕人工智能在个性化教育中的应用展开讨论,重点探讨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教育平台的设计与实施。

二、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教育平台设计

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教育平台设计包括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智能推荐引擎及学习管理评估模块。通过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并分析其学习行为,平台能够识别学生的优势和薄弱环节,为其推荐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任务。平台提供个性化学习计划和自适应学习系统,根据学生进度自动调整任务难度,确保合